

史志学习资料

(一)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一月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在怀仁堂召开会议

胡乔木、薄一波同志到会 作重要讲话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商议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问题。党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和丛书各卷主编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邓力群同志主持。胡乔木、薄一波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乔木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经过三十三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于这些，世界上很少了解，中国人自己也很少了解，因为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把各项工作的经验和成就做过系统地叙述和宣传。我们究竟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哪些完全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创造的？哪些得到过国外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帮助？我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些发展过程中间有哪些主要的经验？有哪些主要人物（不只是少数个人，包括广大群众）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所有这些，现在非常需要赶快整理，加以总结，分门别类编成书出版。

乔木同志提出，丛书要记录的事实，要总结的经验，主要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各部门业务本身的发展，本身的成就，本身的经验。有的人，一回顾，就觉得我们过去的三十三年简直一无是处。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各项事业中，确实也有极少数项目发展不大，但大多数都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所做的工作，尽管还有问题，还有很多薄弱的、落后的环节，但首先是取得了成就。如果不在我们人民中间、干部中间、青年中间做一种系统的宣传，那就很难怪现在某些范围里面存在思想混乱。我们正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我们要收集材料，有反映顺利的材料，有反映失误的材料，有数字的材料，有形象的、图形的材料，用这些把我们的发展和成就记录下来，并跟旧中国加以对比。这样，大家就会了解，尽管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但那不是白走的，吸取了教训。我们并不是在往后退，并不是停在那里不动，而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过在前进中间有一些损失就是了。我们经济建设前进的速度，虽不能跟世界最高的速度相比，但也是相当高的；与旧中国比，那就高的非常多了。当然，记录各方面的成绩，应该是科学的、严谨的，不能掺假，不能夸大。这样，我们的丛书，就可以增强人民的信心，团结人民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时，可以记录下我们的干部、群众所做的奋斗，记录下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使人们了解今天的中国来之不易，也给后人一种榜样。出版这套丛书，还可以把中国的发展变化报告给全世界。现在外国人对中国并不了解。有些外国人也写了些书，但这些书或者传播不广，或者里面有很多的歪曲，有的甚至有很多恶意的攻击。对于在世界上流传的关于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我们如果不起来加以

纠正，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人民，那就是我们的错误，出版这套丛书，又可以为干部教育提供教材。高等学校，党校，需要对现代中国进行一些科学的讲解，非常需要系统的材料，丛书可以作为这样的教材。最后，出版这套丛书，还能为将来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如果现在不做这个工作，等到建国五十年的时候再做那就更困难了。时间拖得越久，写起来就会越困难，材料会越来越少的。就是现在，有些材料也需要重新收集，从头收集，还需要重新去拍一些照片。

乔木同志指出，这套书是科学的著作，但不是很抽象的，而是需要有一些历史的生动的具体叙述。写各部门发展的经验，或者说规律，这当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不能够用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来代替各个业务部门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不完全一样，尽管二者之间有关系。各个部门工作发展历史的规律性的东西，需要重新研究。丛书要完成上面讲的任务，各卷篇幅不可能是很小的，二百来页的小册子，恐怕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想到这是一种奠基性的著作，宁可写得大一些，让后人去删改；如果写得太简单了，就没有多大的教育价值。这套书当然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希望不要把它写成简单的宣传鼓动性的作品，要保持这些著作的科学性。它的意义要由著作本身表现出来，而不是由作者在里边发许多不必要的议论来表现。

乔木同志说，编写《当代中国》丛书这项工作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有一些书，恐怕仅仅中央部门还不够。还需要地方部门的合作，需要他们提供材料。但我们相信，只要真正把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

把可以动员的力量动员起来，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书是可以写成的。

一波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编写《当代中国》丛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把我们三十多年的历史、成就告诉大家，使大家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各卷都写出来以后，作为一种教材也罢，作为别的什么也罢，能够使当代的中国人了解当代中国。只要书写得好、写得成功，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工作都有指导、借鉴作用，并将作为国家的财富保存下来，造福于后代。

一波同志讲到怎样写这套丛书时指出，我们有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写各方面历史的政治上的准绳。我们要考虑，在书中怎样体现党的领导，怎样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怎样体现干部和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这是大有写头的。

一波同志还指出，在写作态度上，要能够把我们的历史真实地叙述出来。可以适当地表达历史上的曲折，作为经验教训，但总的是要把我们的成绩充分写出来。尽管我们有过一些曲折，但成绩是伟大的，应该加以肯定。我们写书，对历史要负责任，对人民要负责任。

一波同志希望各部门都把编写《当代中国》丛书重要任务列入工作日程。领导要带头，不一定是亲自写，而是要召开会议，组织班子，布置任务，督促检查。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有委员171人，多是当过部长、副部长的，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前半辈子当部长，当主任，对党、对人民有贡献，剩下的时间，响应乔木同志的号召，写部书，很有意义。我们要把这个工作做为中顾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支持

写好这套丛书。

乔木、一波同志讲话后，编辑部丁伟志同志向大会简要汇报了提出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过程和前一段工作的进展情况。接着，国家计委房维中、总政治部华楠、轻工业部李龙、国家气象局薛伟民等四位同志发了言。他们都表示非常赞成编辑部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将努力把自己负责的有关卷写好，并向大会汇报了组织编写工作的情况。

最后，邓力群同志说：一，会议之后，请各单位把自己的选题定下来，二月底报编委会。选题定下来以后，就是组织编写队伍。这要充分动员退下来的老同志，退到第二线的，退到第三线的，都请他们来接这件事。能够写作的，不能够写作的，只要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请他来谈，来议论，来回忆，提供材料。这些同志很想做点工作，也能够做点工作，现在在领导岗位上的同志要重视他们，把这个力量充分组织起来。不但是领导同志，包括一般干部，愿意而且能够参加这个工作的，都要采取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二，主编增加武衡同志。编委里头，要增加一位中国科学院的同志，会后请科学院推荐一位。

邓力群同志关于如何写好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的谈话（摘 要）

一九八三七月十八日

（一）这本书应有充分的说理性，而不是使人看了感到有一种随意性。每次改革，要写明为什么非改不可，客观实际的根据是什么？改得成功的或不成功的，都要用事实材料说明。材料要经过核对，既要具体的、形象的，又要综合性的、全面的材料。如果没有综合性的全面的材料，光是具体的材料，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但并不能反映改革的全貌。

这本书要用事实说话，从事实分析中得出规律性的原则性的结论。有些结论，我们不作，人家看了会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的结论不对，人家也可重新研究，得出比我们更正确的意见来。

千万要避免写成原则结论的堆积，条例法令的汇编，枯燥无味，看不下去。

拿《资本论》来说，写得是很概括的。但除第一章商品比较抽象难懂外，其他各章都用丰富的材料引证，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它的逻辑很严密，这点我们难以做到。

如何占有材料，使这本书有很丰富的内容。三十多年历史进程，写成书后，外国人看了尽管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作为历史是有帮助的，而且是有权威性的。

特别重要的，是以材料说话，丰富多彩。

特别要收集说明每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事实根据，以站得住的事实说明改革后的变化。

马克思写《资本论》序言，不是以概念与概念比，不是以概念与事实比，而是以事实与事实比，揭露事物的内在联系。

拿第一件事情讲，公私合营前，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监督，那时，工人发言权相当大。实现公私合营派了公方代表后，普遍感到工人讲话不如以前算数了。要说明这个变化，公私合营以前，工人实行监督，有自己的政权作为依靠，有党的领导，党只有依靠工人才能同资本家斗争。公方代表一进工厂，他本身是公家人，他感到可以不依靠工人了，上边如何讲，他可照本宣科，命令行事。这里有个体制问题，如果既有公方代表，又有工人监督权（这些监督权当然与前有所不同），就比较好。但当时我们未找到这种形式。把这件事讲清楚，对革命刚成功的党是有帮助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书只写公私合营前实行工人监督，合营后派公方代表，那么，使人看了干巴巴，引不起兴趣，也没有效益。

农村也是如此，初级社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很快转入高级社，现在来看是该转的，问题是没有把初级社的优点保存下来。人民公社化后，更是简单化了，以致于我们现在要重新回头来搞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调动社员积极性。记得一九五七年二月，全国高级社完成了，好多地方并社，小社

并成大社。我同少奇同志出去，从河北省往南走，先到满城，农民说我们村庄稼种得好，粮食收得多，办法好，土质也好；邻村种得不好，收成也不好。结果几个村合成一个高级社，统一分配，眼看粮食一车车往收成不好的村拉，真是心疼难受啊！到了邯郸、邢台一带，农民说：社真大，我们找社长要买火车票。到河南新乡，耿其昌说：现在社太大，好多层次，统一分配，弄得意见很多。他们提出：社不要搞那么大，或者不要那么集中，给各社队以自主权，容许各队有差别等。你们要有这样一类生动丰富的材料，包括来自人民的生动语言，这语言又要能说明问题性质的。

马克思说过，研究问题从具体到抽象，说明问题从抽象到具体。两者要结合得很好。

（二）要有史有论，光论无史，都不好。有史有论，比逻辑推理，从这个原则到那个原则，从这个条例到那个条例，从这个办法到那个办法，要难写得多。要使读者和后人看到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历史面貌原来如此。

不是光写史，如果光是史，只要编个文件汇编就行了。也不是单纯的论什么，而是我国三十多年发展的一个方面。如果写成论什么，就不是《当代中国》丛书的要求，而是专著了。

（三）要达到上述目的，没有丰富的材料不行。我特别担心你们具体材料是否丰富。如果你们的材料仅仅是办法、讲话，那将形成结论汇编、条例汇编、概念演绎。

写之前要检查一下材料够不够。如不够，再收集一下。材料不限于决定、办法、文件、讲话，着重的是每个文件产生的根据，每个决定执行后的变化，包括向好的方面变化和

向坏的方面变化。

（四）我担心《当代中国》丛书出来后，看过一本，再看第二本，就不想看了。当然有共性的东西，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要首先给人以共性的东西，而要先给人以个性的东西。使人从个性中看出共性。一五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十年动乱时期和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哪个部写的书，也脱不开这个过程。但如果煤炭部、冶金部、轻工部等各部都仅仅写些过程，那么人家只看一本就够了。书写得好的，不是先给人共性的印象，而是先写出特点，从中看出共性的东西来。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邓力群同志在 第三次编辑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记录稿)

编写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百科全书，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型丛书。要通过这套大型丛书，充分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看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国的历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部书不仅要给人以知识，而且要给人以力量，让人们看了这部书更加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更加相信我们党领导的事业有无限美好的前途。也就是说，读者读完这部书后，能够增强信心，鼓舞干劲，继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奋斗。

三十多来，我们的事业有挫折，但这些挫折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克服的。我们在克服这些挫折中前进了，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大大前进了。对于这些缺点和挫折不需要隐讳。用不着我们编造，只要把事实如实地反映出来，就能使人们正确了解我们的国家，就会给人们一种信心。

这部书要有高标准，每一卷都要有高标准，都要有各自

的特色（也能有各自的特色），不能千篇一律，不能使人看了一本、两本后觉得差不多，没有兴趣再往下看了。要使读者看一本有一本的收获。不论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想要了解新中国，看这部书就可以了解到。看一本后，能了解一个方面，这就可以使人们产生不断求知的欲望。

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丰富的确凿可靠的材料，绝对不要浮夸的虚假的材料。浮夸、虚假的材料一个也不要。条卷写法不尽相同，但要尽可能有新旧中国对比的材料。各个部门、各行各业只要掌握了材料，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哪怕是这个部门受到了很大挫折，但与旧中国比较，也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昨天我看到一份材料讲，一九八二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是旧中国历年工业产值总和的三十倍。各部门、各行各业的水平有高有低，发展快慢不一，有些东西完全是从无到有，如飞机、汽车、原子弹、氢弹、导弹等。我们的国防工业虽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落后一截，但要比旧中国强多了。我跟詹武同志他们说，我们对体制改革看法可能不准确，得出的结论也可能需要推敲，但只要我们这卷书用的材料是实在的、确凿的、丰富的，对后人就会有益，他们就可以继续研究，从中提出新看法、作出更正确的结论。如果缺乏材料，都是空论，即使你的结论是正确的，那对后人帮助也不大，是不可取的。我们这部书要积累丰富、准确的材料，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距离原来的要求太远了。有了材料后，还有个整理问题。如果都是年表似的，人家看起来就没有兴趣了。要系统整理，反复修改，做到顺理成章。

无论是先出的书也好，还是后出的书也好，都要立下一个高标准要求自己，整个编辑部要有高标准，每卷书的编写

者也要有标准。总之，要有丰富、翔实材料，又整理得比较好，文字也要写得有声有色。书中要包括英雄人物的光辉业绩，这样才能有血有肉。这里特别提一下那些无名英雄。前几天一个搞有色金属的同志来看我，他说有色金属战线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过去由于保密，那些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全心全意地日以继夜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辛勤劳动的同志，不为人们知道，默默无闻，是无名英雄。我们的书要反映这些同志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乔木同志说：宣传人道主义异化的人说我们眼里没有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即使是“大跃进”，还不是想使人民生活过得好一些！问题是懂得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结果反使人民受了苦。这就告诉了我们如何看待挫折。缺点不要回避，但要正确分析。正确分析会给人鼓励，而不会使人泄气。

我们的书既要有共同性的东西，也要有个性的东西。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要具体的个性的东西来体现。各部门、各行各业有各自的特点、特性。正如我们都是人，但每个人的长相、思想都不同一样。我们并不是见了一个人，就不想见第二个人了，不是找一个同志谈了话，就不想找第二个同志谈了。要通过个性、特殊性来反映共性。毛主席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在每本书中体现好了，全书就丰富多彩了。如果每个部门、各行各业写出的书都是一个模子，都是那么几句话，那么几个结论，尽管出二百多卷，对读者也无益处，那就糟糕了。说丛书难写，难就难在这里。但只要每卷书有丰富的材料，并加以整理，就不会雷同。如果没有丰富的材料，凭片面的零碎的材料进行分析和概括，得出结论，都是一个样子。这不论对写作人员也好，还是对编辑人员也好

就失败了。我们干了三十多年了，难道各个部门就没有自己特殊的贡献，否则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的丛书，好比是花。百花齐放，每种花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样式、香味，它们生长的季节也各不相同。怎样做到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般寓于特殊性之中，列宁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方法。列宁说：“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理，但是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原理的具体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又说：“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的这种普遍！”我们的书，如果只有脱离具体实际的抽象的普遍，而不是用丰富的材料来体现这个普遍，就是没有个性的普遍。今年要出的几卷书，以后还要陆陆续续出的书，都要拿列宁这几句话作为思想上的指导方法。每个东西都有丰富的内容，我们要掌握它的全部丰富性，通过它来体现一般性的东西。人物传也应这样，十大元帅有一个坏家伙。九个元帅都是好同志，都是党员，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的特殊经历、生活，也就是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因此，人们看了《陈毅传》还愿意看到《彭德怀传》，不会看了一本就不想看另一本了。“文化大革命”前出的《列宁传》、《斯大林传略》，就让人看不下去了。比如《斯大林传略》讲的都是他哪年做了一些什么事，哪年发表了什么著作，他的丰富个性都看不出来。《列宁传》也是这样。刚才卫生部的同志不是提到读者对象吗，你那卷书只要体现出了特点，一般读者要想了解卫生方面的事，就可以看这卷书。本行业的工作人员也会喜欢看。总之，每卷书都要有自己的特点，要通过各

卷来体现我国三十多年的巨大变化。

有关涉外的事情要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写，不要拿今天的政策，去裁剪当时的历史。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写，不要挖苦，不要骂娘，心平气和地说，这就站得住脚。如果经过调查、核对，不是事实的，尽管过去花过很大力气宣传过的，作过重大斗争的，那也不要再说了。比如过去我们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苏联国内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些材料是不是正确？小平同志讲，苏联实行的国内政策是不是修正主义，还是让他们的人民自己去下结论。涉外的事情，如果材料确有把握就上，没有把握就不上。当然，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书的内容有了，还有印刷问题。不仅内容要高标准，而且装帧设计、纸张、材料、印刷都要是最好的。要下点本钱。要图文并茂，图片有彩色的就用彩色的，黑白的也要搞好。校对要保证没有错误，要做到一个错字也没有。不要书一出来，后面又跟一张勘误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更正。更保证内容上的高质量，形式上的高水平。写作人员要尽最大的努力，审稿人员要负责，要把好关。

现在各单位搞整党，我们不好说你不要参加，这是当前很重要的事情。但可以安排得好些，合理些。每个部门都有研究机关，都有院校，总有专家、学者，这些人都是内行，可以请他们参加做这项工作。有的部门专家不会很多，但总会有的吧！只要他们确实是专家，确实有学问，就可以请他们出来帮忙，看看书稿，提提意见，帮助修改。即使不能对全书提出意见，能对那涉及他所从事的业务章节提出意见也好。要找专家请教，那怕是一个问题，一个细节也好嘛。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他们实践经验多，对材料有判断力，

但缺乏概括的能力。而专家、学者又常常缺乏材料。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不论是找写作的，还是找审稿的，我们的视野要放宽一些。那些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写文章一般不大行，但可以找他们谈谈。他们工作了几十年，有丰富的经验，是可以议论出一些道理来的。

社科出版社、丛书编辑部，要好好组织力量，现在就要进入阵地。要分好工，哪个人和哪一卷联系。除个人看以外，还要有适当的集体讨论。要和编写书的人好好合作。这并不是说编辑有多大本事。但他们有编辑经验，了解读者的希望，可以向编书人反映读者的希望。编辑和写作的同志要通力合作。第一炮一定要打响，第一批书标准低了，以后就麻烦了。这几个月编辑要紧张努力。体制改革卷我看，马洪同志也看一本。大家力争高标准，最好国庆节出几本。但也不要因为赶时间，降低标准，质量还是第一。

邵文杰同志在地市史志总编 室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会上传达了岳阳会议和桂林会议精神，大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对我省今后修志工作有很大帮助；也提出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代表省史志编委，向大家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对省史志编委多提批评意见，帮助我们对史志编纂工作进行更好的改革。

有些问题佩明、静琦、颖生同志已谈过了，我同意。我现在着重谈谈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和大家共同研究。

一、史和志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史、什么是志，什么是旧志、什么是新志，这是个大问题。

史和志又要分、又难分。二十四史是史还是志？我认为总的来讲都是史，如把史和志加以分别，则是有史有志，史里有志，志里有史。从广义上讲，一方之志也是史，过去发生的事情、个人的经历，都是史。世界有世界史，地方有地方史。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大体上把史和志加以区别，弄清楚史的特点是什么，志的特点是什么，新志的特点又是什么。